

以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解讀電影 《我和我的祖國》

陳華凱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李亞明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藉由「批判性地緣政治」或「後現代地緣政治」的理論，以中國國慶期間的官方宣傳電影—《我和我的祖國》的故事內容為文本，探索電影故事如何構成地緣政治故事情節的論述，以及其如何形成中國大陸通俗大眾的認知地圖、形成特定的地緣政治想像，進一步表現出國家的認同。研究發現，電影以小人物為主角的故事情節，更能貼近通俗大眾的想像，並能引發身歷其境的認同感，直接地催化了中國大陸通俗大眾關於「中國」的地理空間想像，也契合了習近平「中國夢」所蘊涵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論述。

關鍵詞：批判性地緣政治、通俗地緣政治、地緣政治想像、論述、故事情節

壹、前言

中國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在2019年9月30日國慶前夕上映，而在此前四個多月，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即已印發《關於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廣泛組織開展《我和我的祖國》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的通知》（以下稱《通知》），¹動員

黨、政、軍從中央到地方要開展主題圍繞在「我和祖國共成長」，充分發揮群眾主體性的主題宣傳活動。

何以中共中央特別在《我和我的祖國》上映前，就以此作為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在以黨領政的體制下，對電影指導、監管製片、發行、放映、對電影內容進行審查、指導協調全國性重大電影活動，都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主要職責。²中共透過電影運動推銷傳播其思想主義，可追塑到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後的電影文化運動。很多電影創作、生產及評論者本身即為共產黨的左翼文藝工作者，通過與電影界的交往、合作，廣泛吸納電影界人士加入左翼陣營，使左翼電影深入社會各階層，大大傳播了中共的主張。即使在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仍以其獨特方式，對本國電影與本國電影市場實行多種多樣的管理與扶植措施。例如，在《國產影片發行放映的考核獎勵辦法》中要求中國電影集團公司（中影）、華夏電影發行有限責任公司（華影）每年必須發行國產影片不低於30部，其中應包含政府推薦的影片至少10部。主要院線電影院也被要求每年須以一個月時間只能放映國片的措施，稱之為「國產電影月」。中國電影發行領域完全限制外商進入，例如「中影進出口分公司」受政府委任，是進口電影的唯一特許業者，而進口影片的發行也唯有透過國家指定的兩家特定公司進行。³前述的華影即是《我和我的祖國》的製片公

-
1.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廣泛組織開展「我和我的祖國」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的通知》〉，2019年5月19日，《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9-05/19/content_5392994.htm>。
 2. 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將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共中央宣傳部管理。請見〈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2018年3月21日，《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1/c_1122570517.htm>。

司。中國黨政主管機關電影政策是全面介入電影市場，並發揮實際影響力，顯示其在《我和我的祖國》電影背後著力之深。

此外，《我和我的祖國》內容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治國理念相契合也有關係，即是呈現其「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參觀中國大陸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時強調，「中國夢」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並且說：「歷史告訴我們，每個人的前途命運都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密切關連。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⁴2019年9月30日，作為向中共建政70周年「獻禮」的《我和我的祖國》電影在大陸公映，其以「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串聯多段式劇情的手法，講述了70年間不同職業、背景及身分下的通俗大眾，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不平凡故事；以平凡人的觀點來看中國的崛起成就；以小人物見證大時代渲染「光明」及蘊涵於其中的國家認同。電影將每個人的前途命運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連結了起來，此正符合了《通知》所要求的群眾性主題宣傳，以講故事展現群眾履職敬業、追夢築夢、奮鬥圓夢的宣傳，展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光輝歷程。這也正是本文欲以《我和我的祖國》作為研究的文本內容。

如果習近平的閱兵式是在現實層面展示了大國崛起的形象，喚起了中國大陸民眾的自信與自豪，增加了對「中國」的認同，那麼電影則從歷史脈絡的層面強化了中國大陸通俗大眾的「地緣政治想像」(geopolitical imagination)，或者是老母雞－中國大陸領土形狀的「地理想像」。我們認知的世界與實際上的世界或許有所出入，但透過媒

3.中共對本國電影的管理與扶植措施大致可歸納為補助(Subsidy)、配額(Quota)與壟斷(Monopoly)三種。請見劉立行，〈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國家與社會》，第4期，2008年6月，頁133-156。

4.洪向華主編，《民族復興中國夢》（北京：紅旗出版社，2013年），頁1。

體傳播的焦點和通俗大眾所能接受的程度，最終會形成一種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形成不同的地緣政治想像與價值認同。電影作為媒體的一種形式，當然也提供了這樣的想像與認同。「地緣政治想像」是指一般大眾對於本國在世界社會中所處的地位與地理位置的普遍想像、概念或論述(discourse)，包括在世界政治中國家認同的位置，敵我認知的圖像，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的特質所形成的認同和邊界（領土邊界的持續形塑與再確認）。⁵此概念來自於國際關係後現代主義理論(postmodernism)與「批判性地緣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或「後現代地緣政治」(postmodern geopolitics)。他們運用後現代主義主張的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研究方法，尤其是以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或大眾文化(mass culture)（例如電影、電視影集、小說、戲劇、音樂、文學等）作為文本，探究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背後的相互文本作用及權力論述實務，藉以顯示其反基礎的知識論立場，顯現出以通俗文化作為研究素材的新奇性。尤其批判性地緣政治中的通俗地緣政治(popular geopolitics)以通俗文化作為理解人民地理想像的途徑，使地緣政治研究更為貼近人民的地理空間想像。

本文欲以上述觀點，藉由描述《我和我的祖國》文本的內容，來展現其隱含或者蘊涵著什麼樣的敘述、隱喻、假定和想像。循此脈絡，本文首先檢視「批判性地緣政治學」的觀點，以及其與傳統、現代地緣政治研究的不同之處；其次論及「批判性地緣政治學」強調的「地緣政治想像」或者是「地理想像」如何形成，並影響人們的價值認同，最後則以電影－陳凱歌總導演的《我和我的祖國》來探討地緣政治想像與國家認同之間的關係，期以「通俗的地緣政治」概念來呈

5. John O'Loughl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Vladimir Kolossov, "Russian Geo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Mask of Proteus Revisite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0, No. 3, September 2005, pp. 322-335.

現及詮釋民眾所未知的真實地緣政治，貼近通俗大眾的地理空間想像，並提供另類的地緣政治觀點。

貳、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觀點

1980 年代晚期，托爾(Gearóid Ó Tuathail)與達爾比(Simon Dalby)提出了「批判性地緣政治學」一詞，⁶其目標在對支撐冷戰時期地緣政治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實踐，提出認識論上的限制。⁷1992 年托爾與安格紐(John Agnew)認為地緣政治不是拿來掩飾外交政策和國家治術的描述性專有名詞，而應將其視為政治論述的一種形式。⁸他們認為地緣政治研究若再陷入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等傳統地緣戰略學者的地理決定論，將會阻礙全球政治互通訊息的模式，且限制了吾人對地理知識的了解，因而結合早期對世界經濟的地緣經濟分析，認為政治地理學者不僅應探究有關政治的地理知識，還應探索世界經濟變遷中的地理形勢，並以後現代主義的角度對現代地緣政治學重新思考、批判與質疑。⁹

安格紐認為，外交政策是知識分子在國際政治中所運用的治術，它代表一種確定型態的地方、人和故事敘述的特性；透過外交政策論述，

-
6. 有關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地緣政治研究的影響，請見 Klaus Dodds,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September 2001, p. 470.
 7.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
 8. Gearóid Ó Tuathail &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2, March 1992, pp. 190-204.
 9. John Agnew, "An Excess of National Exceptionalism: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 2, Issue 2, April 1983, pp. 151-166.

世界是一種活躍的空間，經由政治領導者依其重要性，劃分、排列成為一種等級制的地域。此一過程提供了政治菁英和公眾一個追求其各自認同和利益的地緣政治框架。¹⁰由於全球權力的不均衡分布和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對有限資源的永恆競爭，結果導致國家軍國主義、領土擴張主義、海外帝國主義和戰爭，這些不僅是正當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¹¹簡言之，批判性地緣政治就是在於批判既有的地緣戰略領土空間觀點所造成地緣政治錯誤想像，必須質疑既有的地緣政治論述。

托爾和達爾比認為在全球政治生活中，地緣政治不是自然產生的，它具有相當的複雜性。他們認為地緣政治學不是以往（傳統、現代地緣政治研究）所認為的是一個穩定的、線性的概念，而是在不同知識生產場域中由行動者所實踐的，用來展現地緣政治知識中的權力關係；他們認為地緣政治是一個更為寬廣的文化現象，而非如傳統地緣政治所理解的是「聰明人的政略」(wise-men's statecraft)，它不是關於治理國家才能的一個特別學派，而是關於國家政略本身在物質上或是再呈現的一種空間實踐；其結果便是批判性地緣政治研究必須探究國家的地緣政治想像、國家的基礎神話與國家特殊人士傳說(national exceptionalist lore)，它們是一國塑造國家認同、劃分疆界、賦予領土意義、建構民族歷史等的時空過程。¹²

托爾認為，地緣政治學應該被定義為一種不加以規範的實踐，政府管理者們可以透過這種實踐來使世界政治空間化，諸如把「世界」以各種地方、民族和事件來再呈現，¹³正因為地緣政治學是在不同的知

10.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2.

11.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pp. 11-85.

12.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p. 3.

13. Gearóid Ó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59.

識場域，由行動者實踐所產生，它涉及全球空間的書寫，需要與以往不同的探求方法，所以只有透過歷史性和情境性，才能完整了解地緣政治的概念。¹⁴ 托爾遂將麥金德的理論置於其所處的時空背景，認為麥金德身處於英國帝國主義與貴族所統治的社會經濟基礎隨著國際與國內物質條件的轉型而消失中，為擁護社會帝國主義，便創造一個陸權論的神話，以因應社會主義勞工階級的興起。¹⁵ 凡尼爾(Pascal Venier)循此途徑梳理了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緣軸心〉(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一文，將該文放置在 20 世紀早期的國際關係、戰略辯論的脈絡，以及英國國王愛德華時期(Edwardian era / Edwardian period)外交政策史料中予以重新詮釋，從文本內容去理解當時英國戰略社群成員的思考和行為方式，進而認為英國在 1904 年期間的外交政策即是以麥金德的理論為基礎；麥金德在對海權與陸權之間平衡趨勢轉換的認定中，特別強調蘇聯對英國的威脅，並企圖透過確認蘇聯為主要的威脅來激發其人民對大英帝國的認同，反而是一種獨特的唯意志論(voluntarism)，而且其觀點也深植於英國的「地緣政治文化」之中。¹⁶ 托爾指出，所有的國家都有地緣政治文化，它是一種關於國家的概念與獨特的認同，在世界上的角色和位置，它關心的是一般公眾對國家在世界事務上的角色和任務、大眾對危險的觀念、外交政策的優先順序，以及國家在國際事務上所面臨的挑戰。¹⁷

14. Gearóid Ó Tuathail, “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24-26.

15. Gearóid Ó Tuathail, “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 and Myth,”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1, January 1992, pp. 100-118.

16. Pascal Veni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Geopolitical Cultur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December 2004, pp. 330-336.

17. Gearóid Ó Tuathail,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ulture: Toward Conceptual

達爾比和托爾也認為地緣政治是鑲嵌在文化之中的，它是關於世界政治的論述，尤其強調國家競爭和權力的地理面向。「論述」指得是文化藉由再呈現的實踐，構成有意義的世界。因而「論述」涉及了世界事務中權力和危險等強制性問題，例如何處是權力的核心和衝突所在？面對世界時的危險和威脅為何？這些是政治菁英最關心的問題；其次，地緣政治目的在於以簡單的用語解釋大量的事務，故而地緣政治論述提供政策規畫者、新聞工作者、公民等一個關於世界政治的全面視界，提供一個讓在地事件能與範圍較大的全球景觀有所關聯的架構；最後，地緣政治是大眾化的，因為它提供洞悉世界事務未來發展的方向；例如世界政治的圖像如何形塑？戰爭將在何處爆發及結束？¹⁸論述不是描述客觀存在的工具，它涉及了這些存在的認知及建構。我們的世界是經由語言和實踐建構出來的，我們認知的政治現實和地緣政治故事情節都只是論述，是講述國際政治故事和使其有意義的特殊方式。¹⁹正因地緣政治是鑲嵌在文化之中，各國皆有其不同的地緣政治文化，蘊含著其國家概念與獨特認同，以及其在世界的角色與位置，它包括一國的地理位置、歷史的形成、官僚組織、國家認同和它與外在世界關係的傳統論述，以及國家中權力網絡的運作；此外，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的傳統和位置，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的特質所形成的認同和邊界，國家和外交政策思想的學派（或稱地緣政治傳統），關於世界政治的特殊論述或敘述形式等，都對一個國家

Clarity in the Critical Study of Geopolitics,” in Lasha Tchanturidze, ed., *Geopolitics: Global Problems and Regional Concerns* (Manitoba: the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2004), p. 85.

18. Gearó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2.

19. Gearo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pp. 6-7.

的地緣政治文化的形成有所影響。²⁰換句話說，對自然地理的文化詮釋在地緣政治文化的形塑上具有重要的影響，所關切的是自然地理的物理空間對於國家人民的地緣政治想像空間的文化實踐及論述。

托爾認為，地緣政治論述是一組允許我們對世界，以及我們的行動與實踐加以組織並賦予意義的能力，而地緣政治論述不僅只是地緣戰略論述，它是一個「相互論述的領域」，包括官方或領導者的建構或呈現世界的治術語言，它構成了地點、定義了劇本和主演者，而其角色和戰略也含括在其中。他遂分析大眾媒體對波士尼亞戰爭的呈現，聚焦於日常的公共政策和社會辯論的論述，探討美國對波士尼亞的政策矛盾。文中透過將地緣議題與政策的再呈現，從「哪裡－地點說明」、「什麼－狀況描述」、「誰－主角類型」、「為何－因果關係」、「又如何－利益的估算」，來說明美國的地緣政治理性是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擺盪，一方面其政策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另一方面也認為自己是地球上最後的希望；美國在 1992 年波士尼亞的政策就是這種矛盾最鮮明的例子。²¹托爾更以電影來探討美國地緣政治文化的改變，認為在 911 之後上映的電影《衝出封鎖線》(*Behind Enemy Lines*)故事情節傳達了美國地緣政治文化中的傑克遜的傳統(a Jacksonian tradition)，它也認為電影虛構了美國對波士尼亞軍事行動的道德感，最後則將電影視為是美國在後 911 時代的軍事主義氛圍；這種氛圍的特質為急切的多邊外交實用主義、強烈單邊的行動的欲望，以及對美國敵人使用暴力有道德的正當性。²²

20. Gearó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pp. 7-9.

21.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the War in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No. 5, June 2002, pp. 601-628.

22. Gearóid Ó Tuathail, “The Frustrations of Geopolitics and the Pleasures of War: *Behind Enemy Lines* and American Geopolitical Culture,” *Geopolitics*,

學者也檢視了2001年9月11的恐怖攻擊後，普丁政府的演說、文稿和重要評論，顯示出俄國對付車臣恐怖分子的故事情節與美國對付塔里班和蓋達的情節相同；故事情節成了俄國與美國及西方結盟的實證。有兩種故事情節出現：溫和派的情節是懷疑他們能否從支持布希政府中獲益，而共產愛國主義者則專注於美國帝國主義者想控制歐亞大陸資源的動機。藉由分析2002年4月對1,800個成人抽樣代表所做的全國調查，了解普丁主導的故事情節，以及公眾的懷疑和反應。²³

簡言之，批判性地緣政治運用大眾媒體及電影論述國家的地緣政治想像及認同，進而質疑與批判國家的地緣政治想像及認同，發展另類的地緣政治觀點，以避免國家運用傳統的地緣政治論述發展成帝國主義、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世界，危害人類生存與和平。

參、地緣政治論述、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如前所述，依據後現代地緣政治或是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地緣政治文化是關於世界政治的論述－意即地緣政治故事情節(geopolitical storyline)。它是關於世界政治的圖像如何形塑，論述不僅是描述客觀存在的工具，它還涉及了這些存在的認知及建構。

一、論述－地緣政治故事情節

傳統地緣政治的基本論調核心在於強調國家菁英治國戰略，忽略非國家行為者及通俗大眾的地緣政治想像，其觀點缺乏地緣政治書寫所需要之全面性連貫的理論，並且只重視在國際政治中以邊界空間為

Vol. 10, No. 2, July 2005, pp. 356-377.

²³ John O'Loughl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Vladimir Kolossov, "Russian Geopolitical Storylin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Wake of 9-11: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and National Surve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No. 3, September 2004, pp. 281-318.

特性的實務運作。地理不是中立的，它絕非隔離於政治和意識形態之外，地理作為一種論述，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知識的形式；以物質環境為基礎的實踐的確都是地緣政治，但唯有透過論述，那些增加海軍軍力或入侵他國的外交決策才有了意義並且獲得正當性(justified)。²⁴我們的世界是經由語言和實踐建構出來的，我們認知的政治現實和「地緣政治故事情節」都是論述，是講述國際政治故事和使其有意義的特殊方式。²⁵透過論述，領導者的行動便可以運用簡易的地理予以理解，外交政策也能有合理解釋，而且透過現有的地理推論，戰爭也能變得有意義。我們是透過語言的社會結構來了解及建構社會實在。政治演說等相關方式將世界政治中有影響力之行為者所了解的世界，化為我們知道的意義，協助我們了解世界的社會結構，以及地理知識在社會建構中的角色。²⁶簡言之，批判性地緣政治認為地緣政治的論述或故事情節建構了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藉由分析論述與故事情節也就能解構其想像與認同。

二、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亨瑞克森(Alan K. Henrikson)認為，國家決策者採用傳統地緣政治學者所構建的外交政策論述，內容則敘述了世界怎會這樣(how the world is)然後敘述我們必須做什麼(what we must do)；也就是他們告訴決策者世界怎麼會這樣，並指導他們如何將國家權力最大化；他並以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為例，分析其所提出的「弧形危機」(arc crisis)及其為政治外交所設定的政治行為空間，主

24. Gearóid Ó Tuathail &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92.

25. Gearó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pp. 6-7.

26. Gearóid Ó Tuathail &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92.

要是讓一般大眾能在不明確且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立即認知政治領導者行動的特質；²⁷政策制定或執行者要傳播其獨特「認知地圖」，讓大眾接受其政策構想，靠的是能夠形成輿論的演說(speech-making)。²⁸美國總統任期內相關的政治觀點演說，其論述內容通常就結合全球政治的時空架構。²⁹地理是世界政治劇場中最主要的背景環境，地緣政治是一種戰略實踐(strategic practice)，透過政治家的演說和政策發言，人們得以對於為何政府要強化軍隊戰力和侵略他國的行為獲得意義上的了解。³⁰

這正是安格紐所言，透過外交政策論述，政治領導者可將世界想像為一種活躍的空間，依其重要性劃分排列成為一種等級制的地域，此一過程提供了政治菁英和公眾一個追求其各自認同和利益的地緣政治框架。批判性地緣政治中的重點及領導者在演說中基於地緣戰略原則的圖像，合理化且先期指導了例如動用軍隊等的政策行動。領袖人物的「地緣政治密碼」(geopolitical codes)建構了「環境—決策者—行動—變換—環境」的連結。³¹由此可見，此種論述的形成是為了政府的決策需要而存在的。這也顯示了以下幾點看法：1. 個人的認知觀念(personal perception)

-
27. Alan K. Henrikson, "The Geographical 'Mental Map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October 1980, p. 505.
28. John O'Loughlin & Richard Gran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residential Speeches, 1946-87,"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4, October 1980, p. 504.
29. John O'Loughlin & Richard Gran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residential Speeches, 1946-87," p. 506.
30. John Agnew & Gearoid Ó Tuathail,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Geo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pril 1987), p. 1.
31. John O'Loughlin & Richard Gran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residential Speeches, 1946-87," p. 528.

ceptions)通常不同於真實(reality)狀況；2. 個人有其慣用於排序或簡化真實存在之地域的認知圖像；3. 認知觀念對於外交政策的制定有其重要性。以個人長期存在的信仰體系為基礎的認知觀念和詮釋，建構了全球或地區的政治環境。每個政策決定者對於「實際上是什麼」和「應該是什麼」的認識，通常與真實有所衝突，但卻不會影響對事件的詮釋。³²由此看來，地緣政治論述為的是地緣政治的「商業目的」，透過政治人物的言詞所形成的論述，可以用來免除死亡的威脅或是建立所欲打擊的目標，是較重要的一種地緣政治論述形式，但卻不是最普遍的形式。作為社會實踐全面性研究的一套政略，地緣政治研究不應局限在少數聰明人所使用的傳統地緣政治語言－以簡單的言詞去描述關於地緣政治上的外交政策問題，以其方式將特殊的世界正常化；地緣政治應該是通俗的，是要以大眾觀點，以通俗的論述來詮釋我們所認知的世界是什麼，而非國家或領導者所認知的世界。³³

通俗的地緣政治指的是一般大眾每日都置身其中的地緣政治論述（地緣政治故事情節）。在民主社會中，與外交政策有關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必須獲得通俗大眾的認可。論述是關於「人們談論世界的方式」，而不是世界實際上是什麼，人們沒有辦法不透過語言和論述去了解「世界本然的狀態」，這也是批判地緣政治學者為何要強調論述（地緣政治故事情節）的重要所在。批判地緣政治學者避免去研究能全面解釋或預測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大型理論，而是以不同的面向去觀察文化力量如何形塑地緣政治的秩序。這涉及了地緣政治觀點和地緣政治傳統與人群團體之間（排除所謂的菁英）的關係。批判地緣政治學者認

32. Alan K. Henrikson, “The Geographical ‘Mental Map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p. 505；有關信念如何形成決策可參閱 Ole R. Holsti,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 No. 3, September 1962, pp. 244-252。

33. Gearoid Ó Tuathail &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194.

為，地緣政治是一個精確反映通俗文化的活動，所以，要了解地緣政治論述的匯集，並再予以呈現的最好方式就是透過媒體，因為大眾心態（mass mind）—非菁英的世界觀及態度—易為媒體所影響及操縱。³⁴

媒體通常指的是新聞媒體，它充斥於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而且不同的媒體（電視、報刊、廣播或網路）會產生及傳播不同的政治想像。透過媒體管道傳播，資訊可以非常快速地傳達給通俗大眾；任何形式的地緣政治論述都要透過廣泛的傳播才能為通俗大眾所認知；地緣政治論述可以經由草根性的討論，由下而上地形塑，也就是當討論時想像有廣大的聽眾，這些「想像的廣大聽眾」最終會成為真實的通俗大眾，即是通俗文化與地緣政治論述形塑了通俗大眾的認同。³⁵在媒體中有關通俗地緣政治的焦點包括新聞媒體—報刊、電視等—也包括通俗文化中的漫畫、電視節目、小說、電影、音樂和網路。人們生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除了親身體驗之外，都是來自於媒體—報刊、電視、廣播及網路等等；媒體占據人們的經驗，沒有這些先入的觀念，人們就無法觀察和感知某個地方的存在。在今日的世界中，沒有資料的讀取、沒有螢幕畫面，人們要怎麼去認識世界？透過媒體，人們認知的世界與實際上的世界或許有所出入，媒體傳播的焦點和通俗大眾的接受程度，最終會形成一種認知地圖，形成不同的地緣政治想像與地緣政治文化。

後現代（批判性）地緣政治認為，世界上的知識都是基於人們對世界預設的觀念所產生的一種反映。地緣政治文化循此概念，認為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而非菁英專屬的象徵，雖然在各知識場域中，文

³⁴. John O'Loughlin & Richard Grant,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residential Speeches, 1946-87," p. 506.

³⁵. Jason Dittmer, *Popular Culture and Geopolitics: Popular Culture, Geopolitics,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0), pp. xv-xxi.

化是孤立、分離、具有獨立的功能，但在國家中卻又完整地組織成一個整體，地緣政治知識中的權力關係是由各種知識場域中的行動者實踐著，因此其共同知識（文化）不僅要透過不同的「論述」展現，而且還要藉由代表的實踐，才構成吾人所認為的世界。³⁶今日在地緣政治理論中缺乏的是通俗大眾的想像與觀點，這也是批判性地緣政治所強調的面向。全球訊息流通在通訊科技、媒體網路、交通發達的狀況下，壓縮了以往時空上的限制，一般大眾對社會規範、價值、認同的建構可以透過網路媒體即時地表達或反應，出自於政治菁英、政客或是戰略社群的論述所建構出來的地緣政治想像，必然要透過媒體（電視、報刊、廣播或網路）廣泛的傳播，經由草根性、由下而上相互主觀的形塑，最終才能成為通俗的地緣政治論述，展現出對世界政治的觀點，藉以質疑、批判或抵抗國家或領導決策者的地緣政治觀點，甚至國家也會反向以通俗的地緣政治論述傳達其地緣政治論述、想像與認同，這也是本文所稱地緣政治文化的焦點所在。

肆、《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地緣政治論述、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接下來將以《我和我的祖國》為文本，探索其中所隱含的中國國家地緣政治故事情節、想像及形塑或再呈現關於文本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以解構此國家官方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一、《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

地緣政治故事情節是一種普遍的論述形式，幾乎在各種社會文化中都存在。故事敘述了某個時空中發生的事件與行動，這些元素的組合則呈現出某種結構形式（即是情節），他們或是提供訊息（例如新

³⁶. Gearóid Ó Tuathail,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p. 1.

聞），或是用來自我表達（例如自傳）、提供娛樂（例如電影、戲劇），或者是強化團體的認同（例如國家歷史、團體活動歷史）等功能。在故事情節的論述或敘述中，人們可以藉由故事來建構自身的認同及與其他人的關係，分析這些故事即可探討人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並且以何種方式呈現。《我和我的祖國》的文字敘述與論述就是故事，就是本文中所指涉的「地緣政治想像」、「地緣政治的故事情節」。故事中所再呈現的地緣政治印象，觀看者會以此來對其所認知的世界進行分類、歸納與認識，形成一套地理空間想像與認同的來源。以下將先簡述《我和我的祖國》的地緣故事情節，繼之探索其地理想像與認同。

在《我和我的祖國》上映期間，另外還有講述登頂珠穆朗瑪峰（聖母峰）歷史的《攀登者》，以及改編自川航事件的《中國機長》兩部影片，也都呈現了登山隊員和民航機組的英雄群像。這三部主旋律電影，無論是票房還是口碑上仍是由《我和我的祖國》奪冠。《我和我的祖國》由七個導演的七個短片組合而成，每個片段約 15-16 分鐘，³⁷ 經由影片鏡頭聲光情節故事再呈現建國 70 年的歷史重要事件。藉由凡夫俗子的故事情節敘述，其中蘊含著中共所要傳達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與想像及認同基調，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以來，「我的祖國（中國）」不再是被列強侵略羞辱的傳統「中國」，「中國人」不再是「一盤散沙」的傳統「中國人」，「我的祖國（中國）」已是超越地理、民族及個體限制，成為富強的國家。

第一段短片〈前夜〉（自動升旗）是一個關於國旗的故事。作為電影的開場篇，沒有制式地宣講開國大典準備的艱辛及犧牲奉獻，而是聚焦於開國大典電動升旗裝置的小小阻斷器上。影片內容是 1949 年「開國大典」前夕，工人林致遠要確保開國大典的電動升旗裝置萬無

37.七位導演皆是著名的獲獎導演，分別是陳凱歌、張一白（張曉陵）、管虎、薛曉路、徐崢、寧浩、文牧野，並由陳凱歌擔任總導演。

一失，修理阻斷器直到大典順利進行的故事。當然其中包括國旗紅綢布的徵集、國歌演奏人選、細緻入微的細節圖、等比縮放的模型、精確到幾公克的國旗重量、街坊鄰居家湊出的紅綢等，故事細節讓「升國旗、奏國歌」，聚焦於平凡普通人物的故事。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國旗與國歌能成為祖國象徵，是由工人平民（無產階級大眾）共同努力奉獻而完成了開國大典的升旗典禮，尤其北京紫禁城天安門廣場更是「新中國」的象徵。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在於「新中國」是屬於人民的祖國，每個人都有「我和我的祖國」的認同感。此「新中國」是帶動後續六個故事的「我的祖國」，清楚地塑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第二段故事是〈相遇〉（原子彈研發），故事是以 1964 年 10 月 16 日第一個原子弹成功試爆作為背景。參與原子弹研發的一位無名英雄—高遠，在和女友確立關係後，就「人間蒸發」。因為原子弹研發是秘密實驗。所有參與的工作人員都與家人親屬斷了三年聯繫。他們再次相遇，已是高遠受輻射後就醫時在公車上相遇。他聽著女友愛憐的哀怨，隱忍情緒不動聲色，直到街上傳出第一顆原子弹試爆成功的消息，高遠才露出了欣慰笑容。國家想要掌握核武器的故事，卻是以研發人員的生活作為敘述，並且藉由新疆戈壁沙漠試爆地理想像連結到北京街道百姓慶賀，串聯中國人民核武強國的夢想實現。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原子弹成為「我的祖國」進入強國之林的象徵，研發人員及其家屬的犧牲奉獻完成了此地緣政治想像，得以不受其他強國的核武威脅，使「核武中國」能突破美國與蘇聯的地緣政治威脅，抵抗帝國主義與共產修正主義的侵略，進而成為三足鼎立的地緣政治局勢，「新中國」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強國。

第三個故事〈奪冠〉（女排奧運奪冠）是以 1984 年 8 月 8 日女排奧運會奪冠作為背景，講述了上海弄堂小老百姓們看電視直播的故事。主角不是女排運動員，而是弄堂裡的小男孩，因為他家是弄堂裡唯一有電視的家庭，他又是唯一會修電視的人。為了順利收看比賽實況，

小孩在天臺上修理天線，後來見到父親一肚子委屈地說「我家天線太爛了」。電影描述小人物如何參與 1980 年代的女排奪冠比賽，如何形成一種難忘的共同記憶，尤其 1981 年女排擊敗日本獲得世界盃冠軍，1982 年獲得世界錦標賽冠軍，1983 年亞洲錦標賽輸於日本，1984 年奧運賽分組賽輸於美國，決賽以直落三局擊敗美國，首次獲得奧運金牌。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中國女排分組賽輸於美國，決賽擊敗美國，象徵著「中國」是可以擊敗「美國」的地理想像；天線也成為「我的祖國」進入科技國家的象徵，藉由修理天線收視女排奧運奪冠，重現中國在 80 年代科技落後的無奈，藉以顯現目前中國衛星直播各項國際競賽及北京奧運奪冠的科技進步，使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的集體記憶產生對比作用，進而塑造今日「我的祖國」、「新中國」的科技強國形象。

第四個是〈回歸〉（香港交接）－大家一聽都知道寫的是香港 97 回歸的故事，香港演員任達華和惠英紅分別飾演鐘錶師傅和香港警察，以香港市民的角度去感受香港的回歸。尤其是惠英紅換帽徽的情節部分是關鍵，以大陸與香港觀眾的共同記憶來看，這意味著掃除自清朝以來百年的不平等條約屈辱，在共同的歷史脈絡中建構出共同的身份認同，殖民地回歸祖國，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地，「英國屬民的香港人」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香港行政特區及香港人民」。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香港 97 回歸」成為「我的祖國」收復國土的象徵，尤其香港警察換帽徽塑造了中國主權與行政權的象徵意義，香港不再是割讓租地或殖民地，中國也不再受到不平等條約屈辱。自此，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地，回歸中國主權管轄，屬於「我的祖國」的領土，「新中國」絕不再受辱簽署不平等條約失去領土。

第五個〈北京你好〉（奧運會門票）故事講述了葛大爺幸運的抽中公司獎勵 2008 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門票，同時很完美的把 2008 年另一件大事汶川地震也融入劇情當中。電影中的計程車司機張北京把自己來之不易的一張奧運開幕式門票，送給了來自四川地震災區的 13 歲小

男孩，這男孩只是要親手摸摸在汶川地震中過世的父親所修建奧運欄杆。故事雖然平凡、市井小民情節，但有人性光輝的一面，更連結了地理相隔千里的四川與北京的中國人，塑造中國人心連心的國家認同。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北京奧運開幕式門票」成為「我的祖國」是大家的祖國，超越了北京與汶川的地理位置及想像。在「我的祖國」、「新中國」北京奧運榮耀的地理政治想像及認同下，汶川與北京已經沒了地理距離，人民相扶持、禍福與共，汶川災民與北京計程車司機都是「祖國榮耀」的人民。

第六個〈白晝流星〉（神舟著陸）講的是兩個貧困兄弟因為搶劫服刑八個月後出獄，對未來毫無方向及計畫，只想不勞而獲。面對他們大伯的管教，哥哥也沒當一回事，還偷拿了大伯的錢。故事後半段是大伯帶兩人去看了宇宙飛船（太空船）的降落。他告訴兩人：「這是你們的白晝流星。」白晝流星是當地一直流傳的傳說，說哪天能在白天看到流星了，那麼他們的貧窮也就到盡頭了。神奇的是，兄弟二人在見到太空人後，竟然還真的改邪歸正，發誓要留在家鄉好好脫貧了。白晝流星傳說的意義，其實就是不斷追尋微渺的希望而不放棄。雖然是兩位貧困兄弟的故事，卻隱喻了正是因為在太空科技的不放棄精神，才能有神舟十一號飛船著陸返鄉故事。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神州太空船著陸」成為「我的祖國」是太空科技強國的象徵，神州載人太空船計畫蘊含著中國大陸的科技進步。搶劫偷竊的兄弟隱喻著對「我的祖國」科技落後的地緣政治想像，只能搶劫偷竊他人的「科技」維生，但見到太空人後，感受到「我的祖國」科技先進，只要自立自強不放棄，太空科技是「白晝流星」，就能脫離貧困而維生。如同中國尋求太空科技發展及進步的過程，最終成就神州太空船重返著陸，「我的祖國」成為了太空科技強國。

最後收尾〈護航〉（替補女飛行員）講的是巾幘不讓鬚眉的故事。學生時代的呂瀟然不服輸，絕不承認比男孩子差，長大後更是不

服輸；從其與男友雷佳音的分手飯局可以看出，呂認為身為飛行員的榮耀比個人感情重要，所以在成為紀念抗戰 70 周年閱兵式備飛飛行員的時候才會覺得委屈，這是犧牲小我成就大我的表現，這也正符合本故事的英文翻譯「One for All」。

在此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中，「紀念抗戰 70 周年閱兵式」是「我的祖國」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象徵，空軍飛行員更是在此閱兵空中分列式的榮譽象徵，尤其「中國」空軍在抗戰期間更是被日本空軍幾乎殲滅。為了「紀念抗戰 70 周年閱兵式」的榮耀，即使犧牲小我也是值得，因為抗戰勝利塑造了「我的祖國」、「新中國」光榮認同。當然在此「中國」空軍抗日戰爭劇情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地緣政治論述、想像與認同，

影片更有著名女歌星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題曲，並在公開播放前做為預告片的 MV 宣傳片，以及影片播放時的片頭曲。另外在片尾時，在合唱聲中邀集各片段真實故事的相關人員敘述當時感想，藉以連結觀眾與真實人物之間《我和我的祖國》的地緣政治想像。

總結以上，《我和我的祖國》這一部主旋律獻禮片，將「新中國」70 年奮鬥的艱苦歷史濃縮在七個故事，藉由故事情節敘述「新中國」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其地緣政治論述是基於宏偉的愛國主題電影，卻摒棄了傳統電影中英雄人物的塑造模式，不再著眼於宏大敘事，轉而拾起「家國認同」的概念，尤其是「新中國」崛起的歷史事件，例如原子彈研發、奧運奪冠、神州著陸、香港回歸等，極力演繹平凡人物角色，展現人物為國犧牲奉獻的群像，塑造「新中國」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這部電影讓觀眾在其中的故事情節論述看到自己，從故事情節中的歷史論述脈絡中找尋到自己，建立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二、《我和我的祖國》中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

從後現代或後結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再現他者的策略是透過某種

特定歷史與權力支配下的論述所建構，揭露這種論述與實踐的知識活動主要是透過對歷史脈絡與權力主體的分析。他者(others)被建構不只是一個語言過程，也是一個文化過程，語言提供一組符號，文化提供一系列意義，他者被符號化的同時，也帶了特定意義。換言之，在特定時空下生產他者的知識，並非在真空中運作而成，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與制度機制下，透過特定應用技術與策略操縱所運作而成。³⁸從中國的「我群」想像來看，其身分認同的基礎便是源於列強欺凌的歷史脈絡，以及艱苦度過經濟匱乏而崛起成為強國所形成。

以往中共每逢建黨、建軍、建政等重大活動前，官方會推出一系列「獻禮」文藝作品，包括電影、劇集、歌曲、紀錄片等，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我群」的想像。政治獻禮片都由黨政軍最高級別宣傳部門定調、立項，國家層面的支持讓歷年來的獻禮片充滿大手筆、大製作、大陣容，政治意義普遍大於商業價值，「主旋律」氛圍濃厚。不過，若仔細比較近 30 年來獻禮片的變化，可以發現獻禮片的表現形式和「主旋律」的論述方式都發生了很大變化。³⁹以中共建政 60 周年時的電影為例，《建國大業》、《天安門》等電影在歷史面向上勾勒出新中國的樣貌，將此一國家的歷史重新詮釋，以建立政權的合法性，希望喚起在個人記憶中的歷史情感。在《建國大業》這部影片中講述

38. 語言如何建構意義再現他者有三條進路：第一種是純粹語言學(linguistics)立場，認為對他者的再現涉及選擇那些語言結構的要素來建構（語言學分析）；其次是符號學(semiotics)立場，認為他者再現是一組符號建構，揭露這些符號內涵的知識活動透過詮釋進行；第三種是本研究所採取的後結構主義社會學或歷史學立場。倪炎元，〈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 58 期，1999 年 1 月，頁 85-111；倪炎元，〈再現的政治：台灣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北：韋伯出版社，2003 年），頁 45-81。

39. 蘇泳霖，〈兩岸軟實力 勝敗已現〉，《中時電子報》，2019 年 9 月 28 日，<<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0928002832-262105?chdtv>>。

自抗日戰爭結束到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發生的一系列故事，主線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籌備，描寫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國國家政治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國共產黨正當化其統治權的所在，在此部電影中的歷史事件故事情節不時表達此論述，但並沒有通俗大眾（小人物）參與的故事情節，人們對其認同並不高，因此在通俗大眾的情感認同缺乏想像空間。這正是批判性地緣政治所強調的人民的地緣政治想像，而非政治菁英的地緣政治想像，中國建政 70 大慶的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則不同於以往，其題材從強調宏大革命敘事和重要領袖人物，逐漸變為刻畫歷史大背景下的平民化人物和生活化故事。

《我和我的祖國》各段短片的故事背景就是源於西方列強欺凌的割地賠款歷史與經濟物資匱乏，必須自立自強的歷史脈絡，「中國」終究崛起成為強國。以中國宣布建政準備工作為始，國際奧運到 2016 年天宮 2 號與神舟 11 號載人飛行任務成功，取得載人航太工程決定性意義的重要成果，地緣政治故事敘事的主要地理空間都在中國大陸，建構出通俗大眾的集體記憶與認同。簡言之，就是整個「中國」的地緣政治想像過程從中國大陸、國際社會（香港回歸、北京奧運）而到宇宙（神舟著陸）；甚至從傳統中國（女排奪冠）到現代新中國（自動升旗、北京奧運、神州著陸、原子彈研發、香港回歸、護航）。

這部電影的名字看起來非常崇高，實際上重點在「我（每一個觀眾的自稱）」，是一部很接地氣的「人民生活史」。在重要的故事場景上看到普通的老百姓、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都兢兢業業地工作，「我」是不可或缺的，用自己微小的光和亮，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豐富的、熱情的「中國」。以往和此故事背景相同或有關的電影不在少數，但相同的故事卻是透過「重寫歷史」來再呈現故事的敘述及其鑲嵌於歷史中的想像。以《我和我的祖國》為例，這種重寫以通俗大眾（小人物）形式再造中國的「認同（身分）」成為媒體傳播的

焦點後，也為廣泛的通俗大眾所接受。經過媒體再呈現的「祖國」形象是中國的地理想像，背後所隱含的則是那面中國的五星國旗，這個想像最終會形成一種認知地圖，形成確定的政治想像與認同的轉移。

這個以電影呈現、故事敘述、歷史改寫等的形式發展出通俗的地緣政治論述，以此將原來鑲嵌於物質地理中的文本，在中國大陸這個地理空間（北京、新疆、上海及香港）中將其再呈現。這個再呈現的過程在中國大陸「社會－文化」的歷史脈絡中逐漸發展出自有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透過媒體（電影）的傳播改變通俗大眾對自我（中國、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圖像（中國崛起成為強國）及地理空間想像（從中國大陸到宇宙），並形塑出有別於以往的認同基礎。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的通俗大眾（透過媒體呈現的觀看者）與這部電影之間的相互主觀性，區分出「我群與他者」、「安全與危險」，以及領土邊界的形塑與再確認。這是一種地緣政治想像（地理想像）的重建，它不是政治和軍事權力體現的結果，也不必然是明確的物質地理界線，因為這些通俗的地緣政治論述透過媒體傳播後，所表達出來的地理想像和憧憬改變了客觀的物質存在。簡言之，「中國」已不再是列強欺凌及貧窮的「中國」，而是富強的「中國」。如果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印刷語言連結了「讀者同胞們」(fellow readers)，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可見之不可見」(visible invisibility)當中，形成了民族的想像共同體。⁴⁰今日由各種不同形式的媒體—特別是兼具故事文本與閱聽感觀的電影—與「讀者同胞們」所形成廣大範圍的「想像的共同體」是以電影故事展開現代性實踐為前提，決定此「想像共同體」實踐程度的大小關鍵，就是閱聽大眾的想像。中國大陸的物質領土可稱是東亞最大的國家，電影故事中的許多地方也不是每個觀看者都曾實際到過，更何況還有許多旅居、僑居在外的華人，

4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pp. 41-46.

但卻因基於共有的文化歷史背景與故事，使其在「我群（身分）」的認同上有所連結及歸屬，這種歸屬感多來自於「想像的共同體」。即使這些華人不一定認同於「中國」或「中國人」，但其對「中國」的地緣政治想像也已經不同於傳統的「中國」了，而是「想像的共同體」或是「讀者同胞們」了。

《我和我的祖國》以小人物為主角，更貼近通俗大眾對故事內容的想像，並引發身歷其境的認同感，直接地催化了通俗大眾關於「中國」的地理空間想像。在現實世界的地緣空間中，由感情所認同且掌握的國家（中國），範圍不再是固定不變，它在全球及宇宙範圍中轉移。昔日受限於物質地理空間的社會文化脈絡，在媒體的傳播及交通的便利快速下，個人也可以創造地理空間的想像。地理想像不僅會因為不同的宗教、種族、政治等立場而有不同，也會在不同時間、空間的文化脈絡中改變。我們生活在一個想像的世界，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除了親身體驗之外，都是來自於日常生活中的媒體—報刊、電視、廣播等等；媒體占據我們的經驗，沒有這些先入的觀念，我們就無法觀察和感知某個地方的存在。在今日的世界中，沒有資料的讀取、沒有螢幕畫面，我們要怎麼去認識世界。透過媒體，我們認知的世界與實際上的世界或許有所出入？媒體傳播的焦點和通俗大眾的接受程度，最終會形成一種認知地圖，形成不同的地理想像。當在歷史故事中小我（小人物）的影像透過電影、大眾媒體（包括網路）傳播時，隱而不顯的影響便在潛移默化之中產生，我們想像的世界也因之成形。認同並非幻象，它是由歷史文化中的記憶、敘述及想像所建構。中共中央宣傳部透過《我和我的祖國》故事中的「我」觀點，使通俗大眾理解和詮釋他們認識的世界，並由此建構出想像中的認同與價值期待（中國夢及強國夢），並轉換成真實世界的意義（中國崛起成為強國）。在觀看者心中，其實有著一幅「中國大陸」的地理想像，這是在政治、文化、歷史脈絡中早就存在的我群認同關係。

伍、中國獨特的地緣政治文化

從後現代地緣政治或是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地理學是一種人與自然交互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的科學，它包括人類、自然環境，以及二者互動這三個層面，形成由理念結構、利益及物質結構所組成的地緣政治結構(geopolitical structure)，即是關於人類、社會力量、認同和文化的論述，是自然環境、設施、資源，所帶來的機會和限制，也是人為現象與技術所帶來的才能和知識。⁴¹人與自然交互關係結合了時間、空間變化，在歷史、地理、科技與社會系絡的交織互動下，地緣政治成為一種更為寬廣的文化想像，構成地緣政治的文化層次－「地緣政治文化」。

中國因其地緣政治特殊性而有其獨特的地緣政治文化。一般而言，中國的地緣政治特點包括了：第一，領土遼闊但相對封閉；第二，地緣政治是以中原為核心的環狀結構；第三，對中原最大威脅都是北方的遊牧和狩獵民族。⁴²在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採取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即是分析歷史上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的進軍線路後，在戰爭初期向西部內陸地區轉移，遲滯日軍的進攻。在冷戰時期，毛澤東跳脫了中國的地緣政治特點，以經濟發達與否為標準提出了「三個世界」的思想，從國家根本利益出發制定地緣政治戰略，發展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和經濟文化往來。⁴³易言之，毛澤東意圖在國際空

41. Zahra Pishgahifard, Mostafa Rashidi, Mohammad Shabanifard, & Mohammad Reza Abdollahpour, “Geopolitical Constructs Understanding and Survey with Constructivism Geography Approach Case Study: IRI and Its Confronting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6, No. 3, September 2010, p. 460.

42.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 71-74。

43. John Agnew,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pp. 1-14.

間脫離蘇聯附庸國的地緣政治想像，建構第三世界領導國家的地緣政治想像，突破美蘇兩強的國際世界間界線。費德曼(George Friedman)曾從歷史宏觀層面分析出中國有三個壓倒性的地緣政治規則。第一，在漢族中國地區保持內部統一；第二，保持對緩衝地區的控制；第三，保護海岸防止外國侵犯。費德曼認為對中國而言，最大的軍事威脅來自美國海軍，但目前卻沒有軍事方面的地緣政治問題。因為中國對緩衝區的有效掌握使其在「物質地理（領土）」上是安全的。中國的地緣政治問題是經濟。第一個地緣政治規則（保持漢族中國的統一）和第三個（保衛海岸），是深受經濟影響的。⁴⁴19世紀末外強入侵是源於沿海的貿易問題，最終導致國家動盪、政府倒塌和內戰。毛澤東通過閉關鎖國和肅清與外國商人勾結的資產階級分子解決了這個問題。繼任者鄧小平認為中國太貧窮了，因此改造「馬克思主義」，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他向外國資本開放，將中國經濟從農業和重工業重新定位在出口導向產業。⁴⁵他相信，依靠忠實的軍隊和共產黨組織，維持強大的中央政府就可以避免這些不利局面。習近平上臺後，中國逐漸浮現自改革開放後，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結果所累積的內部矛盾與壓力。習近平掌權後認為，中國要繼續保持增長態勢，必須重組國內經濟結構並增加外部的競爭能力。在連續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下，既有的經濟系統無法支撐國內豐沛的生產力，面對各種挑戰和日益嚴重的問題，中國必須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引擎—輸出轉移這些產能達成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產業升級。習近平顯然看到中國經濟的潛在危機，故而要求「防範各種風險，早作謀畫，未雨綢繆，

44. George Friedman,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 A Great Power Enclosed," June 15, 2008, *wikileaks.org*, <https://wikileaks.org/gifiles/attach/37/37562_GEOPOLITICS%20of%20China%20080615.pdf>.

45. 1987年10月25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核心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

及時採取應對措施，盡可能減少其負面影響。」為解決此一問題，習近平於上任之初隨即提出「中國夢」作為其治國理念。他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訴求，將人民的希望導向於未來的「夢想」，以維護中共政權的存續，凝聚中國共產黨員的向心力，強化民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信心。⁴⁶這個「中國夢」正代表著中共建政以來或甚至說近代中國以來，中國人地緣政治想像的夢想。

中國以經濟發展作為「中華民族」的統一手段，二者實為一體兩面；儘管中國有三個壓倒性的地緣政治規則，究其根源是經濟問題。中共中央以促進經濟增長保持漢族中國的統一，試圖以「中國夢」重建民族共識，確立新的發展目標。然而「夢」的做法不以社會主義理論為基石，缺少了界定中國在社會主義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歷史方位而顯得空虛、漂浮、大而不當；儘管官方開動宣傳機器大肆宣傳，但難以獲得社會的廣泛認可，因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是無法解釋「中國夢」與「強國夢」走向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但中共中央以《通知》動員黨、政、軍從中央到地方，配合《我和我的祖國》發揮群眾主體性宣傳活動，提供了中國社會大眾認知政治現實和地緣政治故事情節的論述框架，傳播欲再呈現的地緣政治想像空間（中國大陸、國際社會與宇宙），是使「夢」有意義的特殊方式。不同於物質地理想像所「規畫」出的領土，是政治和軍事權力體現的結果（土地、人口、資源的擁有），電影文本敘述中所再呈現的地理空間想像，不僅會因為不同的宗教、種族、政治等立場而有不同，也會因為時空推移、文化差異、政治認同、價值取向等主觀因素下產生不同的影響。當《我和我的祖國》中描述的各個故事在傳遞給通俗大眾後，他們如何理解與詮釋所處的地理空間，是否能在這獨特的地緣政治文

46. 鄭永年，〈「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聯合早報》，2013年5月14日，<<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ang-yong-nian/story20130514-201931>>。

化中喚起集體記憶與認同，再呈現共同的地理空間想像？

對於批判性地緣政治學者而言，歷史的解釋通常有「權力」的因素存在。在權力「中心」的運作機制下，地緣空間的記憶和共同文化的再現，都是從過去的內容中去選擇與逐漸累積形成的，它所揭示的空間想像與認同的建構，都是論述的詮釋與再現。中國官方宣傳電影《我和我的祖國》七個短片在空間、歷史及文化系絡中所展現出來的，主要是以漢族為中心的國族認同與想像，但中國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包裝，是希望能擴大穩固其統治基礎。中華民族是後天建構的，為了建構中華民族，必須將過去重新賦予意義。透過後天的建構，巧妙的將不同的種族整合在一個中華民族的想像之中。不論是民族都有著同樣的起源（中華民族）、一樣的歷史經驗（抗日）、眾多為國捐軀的英雄史詩（英雄人物、特殊人士傳說）；透過《我和我的祖國》尋找、訴說共同的歷史經驗（開國建政、原子彈研發、奧運奪冠、香港交接、北京奧運、神舟著陸），藉此拉近原本疏遠的距離。透過論述一地緣政治故事情節的再現，重新形塑中國人民的共同歷史、文化及記憶。然而，身分的認同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演化，對手、敵人抑或是「我群」都沒有固定的界線，他們只是在一定的時間中找到暫時性的位置（例如護航片段中的性別距離）。這一切在在顯示出中國以國家權力藉由《我和我的祖國》的論述或故事情節所要建構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中國大陸、國際社會到宇宙），但就批判性地緣政治研究而言，分析《我和我的祖國》呈現出其建構過程中的權力與知識的關係，這正是批判性地緣政治批判傳統地緣政治及其所強調的論點。

陸、結論

傳統或現代的地緣政治理論的目標在揭開隱藏在地理和政治之中的知識，並運用此知識來增進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此地緣政治知識和國家生存、資源、領土、財富密切相關，這種知識也成為國家面對未

來競爭的武器選項之一。的確，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新的領土地圖繪製總是隨著國家軍力變化而改變，造就了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的強國。然而批判性地緣政治則尋求在學術知識和權力上建立截然不同的關係。批判性地緣政治屬於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的一個分支，強調解構傳統地緣政治理論，它本應對非西方地緣政治學說的歷史發展投以更多的關注，然卻非如此。中國大陸在學習和引進西方地理學的過程中接觸到了地緣政治學，但是在批判性地緣政治理論上並沒有發展。當中國處於戰爭環境中的國共雙方，分別形成了「以空間換時間」、「持久戰戰略」的傳統地緣政治戰略思想。即使在冷戰期間，不論是西方的「分裂帶理論」還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僅可約略將其歸為現代地緣政治學。冷戰後，中國地緣政治學一直無法擺脫前蘇聯學術界的影響。中國地緣政治學多為現象描述、經驗判斷遠多於理論探討，這多少受到中國地緣政治特殊性的影響。有中國學者認為，地緣政治過程是空間過程與時間過程相互交織形成的複雜地緣政治空間系統，未來的中國地緣政治學，應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深化對於地緣政治空間的探索。⁴⁷因此本文以西方的後現代地緣政治或批判性地緣政治的觀點，分析中國《我和我的祖國》電影中的國家地緣政治想像是否存在於一般大眾的集體記憶與認同之中。

當然可以對觀看過《我和我的祖國》電影的中國大陸民眾進行調查研究，但批判性或後現代的地緣政治的知識目標並不是在觀眾的集體記憶與認同，其知識目標之一是在質疑以國家為中心的地緣政治學，質疑國家的地緣政治論述。其重點在於是什麼過程讓我們將自己想成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何以這樣的國家認同如此確信？在本文中將電影劇情作為對空間的書寫與認同實踐的文本，也將其類比成當前地緣政治的真實狀況，使虛擬的地理空間與地緣政治實務的世界產生相

47.周驍男，〈中國地緣政治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長春），第246期，2010年7月，頁22-26。

互文本性，藉以理解中國通俗大眾地緣政治的觀點與內容，進而論述其中反映出中國國家權力政治的有效性。地緣政治論述（地緣政治故事情節）所形塑出來的地緣政治傳統，通常是為了統治者的需要。由統治階層所主導的論述，決定哪些論述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他們以其認為重要的論述方式來理解、認識這個世界，以其認知的圖像來影響國家身分認同及訂定外交政策。如此吾人遂可以理解《我和我的祖國》和「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如何連結形成中國人民的地緣政治想像與認同。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後，在2012年11月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中國夢」，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並主導跨國經濟帶，為中國帶來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試圖構築了一個未來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圖像。「中國夢」既強調國內建設和人民富足，也強調中國擺脫百年屈辱史、在國際體系中的重新崛起，和獲得大國應該享有的國際尊重和地位。這不僅是中國國內政治的問題，也是中國領導人對國際局勢認知下而發展出的論述－地緣政治故事情節。

從上映的票房及民眾的反應而言，《我和我的祖國》此一文本與觀看者的相互主觀性，的確發展出中國大陸地理空間的想像及認同，這是通俗的地緣政治論述透過媒體傳播後所表達出來的一種地理想像和憧憬（中國大陸、國際社會、宇宙、強國）。再深一層來看，它是中國通俗大眾所希望「中國」在世界上應有的強國崛起角色和位置，是一種關於「國家」的概念與獨特的認同。與此同時，《我和我的祖國》所建構的「地緣政治故事情節」，也是由上而下的形塑過程與建構，反映了中國以黨領政權力政治的有效性，目的在將國家權力最大化，以符合統治者的價值或利益。在政治系統的運作中，中國領導階層以地緣政治論述去獲得改變、掌握組織行動與實踐，並賦予意義的主導能力的同時，也和一般民眾的地理想像相互構成「強國崛起」的國家認同，它是一種地緣政治論述輸入、國家政策輸出、並在國際環

境影響下修改，且形成反饋作用。雖然國族（家）認同總是在以國界為基礎的國際政治體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認同並不總是以國界為依歸，⁴⁸《我和我的祖國》證明了國家認同是被建構出來的。即使是從另類的後現代或批判性地緣政治的地緣政治文化中，仍可以觀察出這樣的權力論述，這也是後現代地緣政治所強調的權力－知識之重點。

（收件：2019年10月27日；修正：2020年7月29日；採用：2020年8月7日）

48. Klaus Dodds, *Geo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96.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

- 洪向華主編，2013。《民族復興中國夢》。北京：紅旗出版社。
- 倪炎元，2003。《再現的政治：台灣媒體對「他者」建構的論述分析》。臺北：韋伯出版社。
- 樓耀亮，2002。《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期刊論文

- 周驥男，2010/7。〈中國地緣政治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長春），第246期，頁22-26。
- 倪炎元，1999/1。〈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第58期，頁85-111。
- 劉立行，2008/6。〈中國電影產業支持性策略之政策法規分析〉，《國家與社會》，第4期，頁133-156。

網際網路

- 2018/3/21。〈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1/c_1122570517.htm>。
- 2019/5/19。〈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廣泛組織開展「我和我的祖國」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的通知》〉，《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19-05/19/content_5392994.htm>。
- 鄭永年，2013/5/14。〈「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聯合

早報》，<<https://www.zaobao.com.sg/forum/expert/zheng-yong-nian/story20130514-201931>>。

蘇泳霖，2019/9/28。〈兩岸軟實力 勝敗已現〉，《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190928002832-262105?chdtv>>。

英文部分

專書

Agnew, John, 1998. *Geopolitics: 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Dittmer, Jason, 2010. *Popular Culture and Geopolitics : Popular Culture, Geopolitics, and Identit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Dodds, Klaus, 2007. *Geopolitic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Ó Tuathail, Gearóid, 1996. *Critical Ge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Global Space*. London: Routledge.

Ó Tuathail, Gearóid, Simon Dalby, & Paul Routledge, eds., 2006. *The Geopolitic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專書論文

Ó Tuathail, Gearóid, 1998. “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6-38.

Ó Tuathail, Gearóid, 2004. “Geo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Culture: Toward

- Conceptual Clarity in the Critical Study of Geopolitics,” in Lasha Tchantouridze, ed., *Geopolitics: Global Problems and Regional Concerns*. Manitoba: the Centre for Defence and Security Studies. pp. 75-102.
- Ó Tuathail, Gearóid, 2006. “General Introduction: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Simon Dalby, & Paul Routledge, eds., *The Geopolitic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pp. 1-14.
- Ó Tuathail, Gearóid & Simon Dalby, 1998.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Gearóid Ó Tuathail & Simon Dalby, eds., *Rethinking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pp. 1-15.

期刊論文

- Agnew, John, 1983/4. “An Excess of National Exceptionalism: Towards a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 2, Issue 2, pp. 151-166.
- Dodds, Klaus, 2001/9. “Political Geography III: Critical Geopolitics after Ten Years,” *Human Geography*, Vol. 25, No. 3, pp. 469-484.
- Henrikson, Alan K., 1980/10. “The Geographical ‘Mental Map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aker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 No. 1, pp. 495-530.
- Holsti, Ole R., 1962/9. “The Belief System and National Images: A Case Study,”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6, No. 3, pp. 244-252.
- O’Loughlin, John & Richard Grant, 1990/12.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residential Speeches, 1946-87,”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0, No. 4, pp. 504-530.
- O’Loughlin, John, Gearóid Ó Tuathail, & Vladimir Kolossov, 2004/9.

- “Russian Geopolitical Storylines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Wake of 9-11: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Analysis and National Surve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7, No. 3, pp. 281-318.
- O’Loughlin, John, Gearóid Ó Tuathail, & Vladimir Kolossov, 2005/9. “Russian Geopolitical Culture and Public Opinion: the Mask of Proteus Revisited,”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0, No. 3, pp. 322-335.
- Ó Tuathail, Gearóid, 1992/1. “Putting Mackinder in His Place: Material Transformations and Myth,”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1, pp. 100-118.
- Ó Tuathail, Gearóid, 2002/6. “Theorizing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 to the War in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21, No. 5, pp. 601-628.
- Ó Tuathail, Gearóid, 2005/7. “The Frustrations of Geopolitics and the Pleasures of War: *Behind Enemy Lines* and American Geopolitical Culture,” *Geopolitics*, Vol. 10, No. 2, pp. 356-377.
- Ó Tuathail, Gearóid & John Agnew, 1992/3.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Geopoli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1, No. 2, pp. 190-204.
- Pishgahifard, Zahra, Mostafa Rashidi, Mohammad Shabanifard, & Mohammad Reza Abdollahpour, 2010/9. “Geopolitical Constructs Understanding and Survey with Constructivism Geography Approach Case Study: IRI and Its Confronting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6, No. 3, pp. 459-467.
- Venier, Pascal, 2004/12.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Geopolitical Culture,”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70, No. 4, pp. 330-336.

研討會論文

Agnew, John & Gearóid Ó Tuathail, 1987/4.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Geopolit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eeting.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網際網路

Friedman, George, 2008/6/15. "The Geopolitics of China: A Great Power Enclosed," *wikileaks.org*, <https://wikileaks.org/gifiles/attach/37/37562_GEOPOLITICS%20of%20China%20080615.pdf>.

The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Me and My Motherland”: A Critical Geopolitics Perspective

Hua-kai Chen

(Ph.D.,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Strategic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Ya-min Lee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Military Affairs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theory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or “postmodern geopolitics” to analyze the official movies of “Me and My Motherland,” which was released on China’s National Day.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how the film constitutes a geopolitical storyline, and how it forms a cognitive map of Mainland China in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forms a specific geopolitical imagining,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s a national identity. Without anyone as the film’s main character,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ilm’s storyline is closer to the popular imagi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Furthermore, it tallies with the geopolitical storyline of Xi Jinping’s “Chinese Dream”.

Keywords: Critical Geopolitics, Popular Geopolitics,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Geopolitical Discourse, Geopolitical Storyline

